

● 中国文学

再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

易竹贤, 陈国恩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易竹贤(1935-), 男, 湖南湘乡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陈国恩(1956-), 男, 浙江鄞县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 何国瑞先生的文学批评, 要求文学作品符合他固定的观念, 表现出教条化的特点; 他的批评实践表明他更看重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抽象本质, 是一种“近乎”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文学观, 难免落入“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老套。

[关键词] 文学批评; 教条化; 工具论; 断章取义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2-0226-06

何国瑞先生在《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题为《评论〈丰乳肥臀〉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争——答易竹贤、陈国恩教授》的文章。我们读后, 觉得该文是对他前文(《歌颂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论之二》, 《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中关于《丰乳肥臀》基本观点的展开, 因为阐述得较为系统, 所以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批评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也显得更为清晰, 故有再评的必要;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 何先生为了反证自己的一贯正确, 在文章中指责易竹贤的学术观点前后发生“大变”, 他为了坐实这一“大变”, 采用断章取义、肢解拼凑的方法歪曲原文, 我们认为这是违背基本学术准则的, 须用事实加以辨正。

—

何先生是尊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 他的文学批评有时连起码的现实主义精神都没有, 因为他判断一部写实作品是否在某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 其标准是他头脑里的固定观念, 而不考虑观念和事实的互动和观念接受实践检验的问题。他刻意回避现实的复杂性和种种矛盾, 按照固定的观念在想象中把生活纯化, 然后拿来对照文学作品的具体描写, 对一切不合这种主观标准的情节、细节提出严厉的指责。显然,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思路的颠倒: 只要求文学作品符合固定的观念, 却不顾及作品的描写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而那一套观念, 其重要的方面又是与现实脱节的。我们批评何先生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的教条化, 主要依据就在这里。

还是从具体问题说起吧。何先生说《丰乳肥臀》写的是以司马库和鲁立人为代表的两种敌对势力的矛盾冲突, 这不错。但何先生的真实意思是认为司马库等人属于反动派, 鲁立人等人是革命者、正面人物。他的所有论证都是以这一正反二分的判断为出发点的, 而作出这一判断的惟一依据就是司马库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鲁立人则是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政委。换言之, 何先生这里的思路是这样的: 司马

^{*} 收稿日期: 2002-08-10

库因为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所以是反动派,而一旦成为“反动派”,就连成为“反动派”之前他也应该是反动的(因此,司马库在加入国民党军队前后的抗日行为在何先生看来是作者对“反动派”的美化,沙月亮打日本人和抢富豪财物这种按何先生的理论本应看做是农民阶级自发的革命举动,由于他后来当了汉奸,在何先生看来也成了“土匪”行为);鲁立人因为是共产党军队的政委,所以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就一定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正面人物。何先生当然没有直接这样说,而且他在后来的文章中也反对我们这样推论。但很显然,这样的逻辑是贯穿在何先生文章中的。否则,他就没有理由严厉指责作者莫言没有把司马库写得足够坏,以显示反动阶级的丑恶本质,没有把鲁立人写得足够好,以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本质。可是这一思路的重大失误也是明显的。第一,它颠倒了认识过程中事实与观念的关系,即思考问题不是面对事实,让观念接受事实的检验,而是用先验的观念来要求事实。第二,它明显地掉进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老套。本来,这两个失误是密切相关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如果用先验的观念来要求事实(现实生活),则必定会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原因就在于认识过程一旦变成从观念到事实的单向度的活动,也即纯粹的、自律的单一观念一旦占据主导地位,成了认识活动中制约一切的力量,成为先验的存在,它就必然会压制和遮蔽现实的丰富性,会要求现实去迎合观念,哪怕要因此扭曲现实的真相也罢。我们与何先生的主要分歧在于,我们认为认识活动中观念与事实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具体到文学批评,应该首先考察作者是如何描写人物的,从作者的具体描写中思考作品的实际意义,而不是先确立一套主观的标准,反过来规范现实生活或替作者进行艺术设计。那么,具体到《丰乳肥臀》,莫言是如何描写鲁立人(暂且先说鲁立人)的呢?很明显,莫言并没有把鲁立人作为共产党人的代表来写,在他的笔下,鲁立人虽有共产党人的阶级觉悟和对战友的感情,但在面临极左势力逼迫时他也产生了动摇,甚至出卖了良知(土改时,贫农徐瞎子为泄私愤,编造人命谎言要挟时任县长的鲁立人枪毙司马库不满10岁的双胞胎女儿,鲁立人始则拒绝,继则为避嫌疑而违心地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不是绝无仅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写出他的复杂性。可是,何先生却从自己的主观出发,首先认定鲁立人是一个十足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他用一套关于共产党人的观念(阶级的抽象物)来衡量鲁立人,因鲁立人的不够完美而认为这是作者对共产党人的歪曲,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攻击。这样的判断,从思维逻辑上说,是推论的小前提不真实;作家本来不是把鲁立人当成共产党人的代表来写,他却硬要按照共产党人的抽象本质指责作家歪曲了这一人物形象。这说明何先生的批判找错了目标。从思想根源上说,这也就是主观化和教条化所造成的问题了。

当然,何先生的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是能获得人们广泛“认可”的,因为那时人们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在文学作品中,按照典型论的基本原理,一个人,人们首先看重的是他作为阶级本质的抽象物而存在,在保证“本质”得到正确表现的前提下,他才作为有个性的人而存在。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哪怕是一个支部书记,他首先是作为共产党的本质的抽象物而存在。谁要是描写共产党人的缺点,尤其是描写某一级别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缺点,他就是攻击共产党。同理,国民党军人(任何反动派)的形象首先是作为反动派的本质的抽象物而存在,谁要是描写这些人物的哪怕一点点良善之处,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就是对反动派的美化了。从本质上看,何先生的思维逻辑是深受这种理论影响的。但是到了今天,这样的理论还有多少市场呢?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也曾犯过路线错误,更何况具体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能和中国共产党的抽象本质划等号的。像林彪、“四人帮”之流受共产党的教育多年,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考验,位居最高层,尚且为了个人一己私利和权欲,干出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谁敢保证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比如小小的政委鲁立人,就没有私心和人格上的弱点?作家就不能写他的缺点,写他对于共产党先锋队本质的背离?

何先生这种主观化、教条化的文学观几乎贯穿在他对所有人物的评价中。比如他在回答我们的文章中写道:“作者(莫言)对地主国民党军队,却是用玫瑰色来加以歌颂。家有短枪队的大地主‘福生堂’二掌柜司马库在书中一出场就是一个活菩萨。同村的赤贫孙哑巴兄弟5个公然在大街上追杀了他家一头大骡子,他不但没说一句狠话,反而赏给了5块大洋。司马库再次亮相时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了。为了阻击日寇,他既在蛟龙河拱石桥上大摆火龙阵,又爬上铁桥锯断钢梁,颠覆了鬼子的军列。”何先生认为

这是《丰乳肥臀》政治上“近乎反动”的重要证据。他的意思,司马库是“福生堂”的二掌柜,就必须以凶神恶煞的面貌出现,就不能有一副“菩萨”心肠,否则就是故意美化。孙哑巴因为其“赤贫”就不能有丝毫的劣迹,否则就是对贫农革命者的污蔑。更不可思议的是,司马库因为是“地主”,何先生似乎就不许他抗日了。大概何先生不至于认为地主就是汉奸,但他的论述中又分明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前提。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他的文学批评不是从作品的具体描写出发,而是从教条出发,从先设的理念出发。

何先生在他的辩驳文章中还列举了几件事实:一是解放后大栏镇在县里指示下搞起了“寡妇改嫁运动”,把所有的寡妇集中起来分配给镇上的光棍汉;二是镇政府办阶级教育展览,被请来控诉还乡团头目司马库罪行的群众反而说司马库是个讲理的人;三是上官想弟(四姐)解放前被迫当妓女挣来的金银首饰在解放后一回到家乡就被公社干部抢了精光。还有改革开放后,大栏市市长鲁胜利(鲁立人和盼弟的女儿)成了大贪污犯;退伍军人高大胆在市政府大门前自焚时高叫:“腐败啊腐败,比慈禧太后还腐败”,“你们这些坐小车的,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冤枉案。”如此等等,何先生皆认为是作者在恶毒攻击共产党。其实,这些倒可以看做是作者莫言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因为只要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就不能不承认这些描写都有现实的依据:类似这样的事在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上还少见吗?有些事情,比如亩产几十万斤粮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比如割断喉管押赴刑场枪毙,一个冤案株连成千上万人等等,要说现实比想象更荒唐也不为过。至于叫几句“腐败啊腐败”,就说是恶毒攻击,我们真的要因此怀疑何先生是否一直闭着眼睛在生活。当然,与其说何先生闭起了眼睛,还不如说他死抱住教条,为了“观念”而不愿正视现实。在他那里,重要的是关于“革命”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历史的具体真实。从现实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这是我们与他的根本分歧。何先生一定会接着说:就算这些都是事实,但社会主义的文学必须对事实(素材)进行选择(典型化)。有些可以写,有些不能照着写,重要的是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社会主义文学是反映生活本质的。这意思是说《丰乳肥臀》所写的多是非本质的现象,它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学!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辨明:一是什么为本质、什么为非本质,不是何先生或哪个人说了能算数的,它必须经受历史和民心的检验。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里先不说《丰乳肥臀》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对负面现象进行否定性的描写来表现历史主流的向前运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具有直面历史真实的勇气,应该从历史的曲折中实事求是地展现生活的进程,而不是用“社会主义”来选择事实——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哪些只能这样写等等。如果“社会主义”不接受历史的检验,不在实践中发展,拒绝承认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不敢面对历史的曲折,只把它当成最高真理的代名词,当成批评家头脑里一成不变的教条,用它横扫一切,批判一切,文过饰非,那是很可悲的。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文艺充其量只是粉饰太平的文艺,甚至会堕落成帮派的文艺。三是——很抱歉,又回到何国瑞先生身上——何先生认为《丰乳肥臀》“彻底歪曲历史真实”,证据之一是那个大栏市市长鲁胜利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了大贪污犯。可是,在何先生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的地方,我们却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就算作品写的多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负面现象,包括鲁胜利堕落为大贪污犯,可是社会在进步,鲁胜利最后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被枪决,这岂非正义的力量取得了胜利,说明共产党还是代表了广泛的民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什么同一个事实,我们与何先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呢?根本的原因,就是何先生认为共产党员的后代(且本人也是共产党员)不能成为贪污犯,作者把她写成贪污犯,就是居心叵测;而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也是人,一旦她(他)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她(他)同样会犯错误,而且其地位越高,其所犯错误的危害性也越大;作者完全可以写这样的事实,关键是他通过这样的事实要表现出真实的历史动向。究竟是何先生这样采取“就是好啊就是好”的方法来辩护有利于人民的事业,还是我们这样直面历史的真实、从曲折的过程中看出历史发展的方向有利于人民的事业,这不是很清楚吗?说实话,被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这样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还得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我们感到非常悲哀,但是又十分无奈。

与上述“政治上近乎反动”的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丰乳肥臀》中的所谓“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事实上,只要仔细读过作品,就会觉得这主要是一个创作风格的问题,原本不必强求作者一定要按某个人的主观标准来处理男女两性关系的。我们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丰乳肥臀》中的两性描写主要跟人物性

格的刻画联系在一起,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这本也是莫言许多作品共有的特点,与他的“我爷爷我奶奶”之类的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曾引起争议,可这事实上并没有怎么影响社会对莫言创作的评价。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莫言并没有对男女两性的描写采取玩味的态度,他的描写还是严肃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敏感、甚至义愤填膺,好像社会伦理秩序要就此崩塌了似的。

行文至此,不得不考虑何先生文学批评的目的问题。他指责这里错误,那里近乎反动,以绝对真理的掌握者自居,设下了许多清规戒律,目的很清楚,是为了保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当然赞成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但也不讳言反对何先生所采用的教条化方法。何先生虽然自称在坚持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同时,“不但没有抹煞,而且要求充分发挥文艺自身的特点”。但看他实际的文学批评,总是以“左”的政治标准从事批判,把一些属于作家个人风格的问题当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上纲上线,把文艺的娱乐因素完全放逐。所以不妨说他的“发挥文艺自身的特点”也仅仅是一句空话,他所看重的其实还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到底是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上述对于《丰乳肥臀》中的人物的简单化分析、教条化的批判,其思想根源就是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念。因为只有从这样的文学观念出发,才会无视作品的具体描写,才会用教条化的方法对作家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何先生反对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由于狭隘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提倡“唱中心,演中心”的那种“工具论”,又确认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具有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我们认为这种理论的实际运用需要正确的立场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做保证。如果运用者自己思想僵化,立场保守,他是完全可能把“阶级斗争的工具”作用发挥到极至的,最终就会导致何先生本来也表示反对的“唱中心,演中心”的那种“工具论”的实际后果。

二

上面分析的是何先生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下文要指出的则是何先生在文学批评中存在着有违基本学术准则(我们固且说是学术准则)的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至少还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后者则连起码的规范也不要了,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就可以片面截取材料甚至不惜肢解作品。比如,在他答复我们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丰》也给予美化。书中日寇一出场不是杀人,而是救人。正当上官鲁氏(母亲)临产几天几夜生不下来,母婴即将双亡时刻,是日本军医救了她母子女三人的命。”这样的论述是很富有煽动性的——何先生的意思很清楚:莫言如此美化日本侵略者,而易与陈又居然大致肯定其描写,当中的潜台词不言自明。可恰恰是何先生自以为得意的地方又暴露出他的问题。《丰乳肥臀》的确写了日本军医受命来为上官鲁氏接生,但正是在接生的过程中日本鬼子枪杀了上官鲁氏的丈夫和同样前来为上官鲁氏接生的孙大姑。故意省略这后一方面的事实,蓄意强调作品是在美化日本侵略者,这就有点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正义和对手的“近乎反动”而不择手段了。当然,如此论证的要害是为了蒙蔽不知底里的读者——倘仅看何先生的文章,读者是会被误导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特意提供全面的材料,请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其实,能否写日本军医救中国的难产妇女本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看作者如何写,而且日本人与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对于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顾及作品的整体描写,不能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来概括作品的倾向。而何先生的问题恰恰在于他拒绝具体分析,只信奉教条:凡是共产党员必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凡是贫农必是完美的革命者,地主则一定是如狼似虎的反动分子,日本人——当然更不用说了,他的逻辑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种违背基本学术准则的做法在何先生指责易竹贤“观念、理论大变”的问题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何先生在他的辩驳文章中对易竹贤的这一指责,同样是建立在他的断章取义和肢解截取法的基础上的。不妨举例来说,比如关于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易竹贤坚持的是辩证的观点。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认为,鲁迅承认文艺“带有”阶级性,但并非“只有”阶级性,鲁迅事实上也承认“共同的人性”和文学的“普

遍性”；鉴于 30 年代文艺斗争的实际情形，鲁迅着重宣传了文艺的阶级性观点，但鲁迅又明确反对把文学的阶级性片面夸大和绝对化的庸俗社会学倾向^[1]（第 237 页）。何先生引述了易竹贤前面关于阶级性的论述，把他引为自己的同道，却不敢引述后面关于共同人性和文学普遍性的观点，那是因为这正好点中了何先生庸俗社会学的要害。又如关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何先生摘引的是易竹贤对“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易竹贤在该文中指出，鲁迅、胡适“共具爱国主义思想”，曾经“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同一敌人，进行着共同的战斗”，又同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学术研究上也“互相学习借鉴”；当然两人同中有异，后来便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道路^[1]（第 97-126 页）。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本来就是把鲁迅和胡适摆在“同等的高度”来对待的，经过何先生肢解截取，却面目全非，成了一篇落入俗套的批胡崇鲁的文章。有鉴于此，易竹贤觉得有必要在此申明，他关于鲁迅与胡适的基本观点是前后一致的，并不存在何先生所谓的后来胡适从鲁迅身上不应有地“分去了一半的崇敬”的问题。何先生使用了评价《丰乳肥臀》同样的方法，曲解原意，经他一摘引、一拼接，好像易竹贤真的前后有“大变”，可是只要读者看看原著，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何先生的这种做法，我们实在不敢恭维。至于个别观点或者某些措辞在近 20 年后有了一些变化，这本属正常的现象，如易竹贤在《胡适传》再版时删去了指胡适为“右翼”的提法。这里的变化有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也有新的时代精神产生影响的问题。但令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何先生摘引只言片语与几十年前的相对照，他的逻辑似乎是要前后一模一样才好。然而，这样的“一模一样”到底是他的光荣，还是他的悖时呢？读何先生的文章，总让人觉得时间的停止。他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基本依据大多是近半个世纪前的流行观点，比如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设置的一切都是为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服务的，尤其是某些关键人物更是作者的代言人，他说：“这一基本理论观点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文学概论》中就给学生讲清楚了，两位教授（按指易、陈）是应该懂得的。”他的意思是《丰乳肥臀》通过金童的视角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近乎反动”的政治倾向。对此我们仅想指出一点，就是何先生所说的大学一年级所学的《文学概论》一定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出版的，它还没能涉及视角的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因素。何先生按照几十年前的观点来答复我们，也按几十年前的观点来批评文学作品，不出现偏差才怪！

何先生在文章中还犯了一些不应犯的错误，现仅举几例。比如我们反对把人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原意是强调必须联系历史条件对人进行具体分析，文学作品写人最忌脸谱化、概念化、模式化。何先生却因此责问：“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上所有的人就都成为一锅粥了，英雄与叛徒、贫农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都失去了固有的界限；汪精卫、蒋介石、希特勒、戈尔巴乔夫等也都不能说是坏人了。”这短短的几句话使何先生观念上的许多糊涂之处暴露无遗。一是他观察文学作品中的事物只看重其经济地位，即贫农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的区别，他是把文学创作视同土改时的划阶级成份了，至于阶级身份与人的精神面貌的复杂关系他就不予考虑；二是他的眼中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因此把汪精卫、蒋介石、希特勒、戈尔巴乔夫一锅煮，至于这些人的差异就不重要了。照这样的理论去要求作家，肯定只有一种结果：要作家把工人、贫农写成“好人”，把地主、资本家写成“坏人”。何先生在这里不是偶尔失误，而是他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反映，是他教条化地从事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依据。而其不妥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说别的，只看他把汪精卫、蒋介石、希特勒、戈尔巴乔夫放在一起，就显得不伦不类；蒋介石至少坚持抗日、反对台独，戈尔巴乔夫的遭遇也决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可是这一切差异在何先生眼里都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坏人”！又比如我们在文章中认为用片面的阶级论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事物是行不通的，会产生类似“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的荒唐错误，其意思是不赞成一段时期曾经盛行的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本性表现的风气，我们给“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打了引号，就是为了强调其缺乏科学性。可是，何先生却严肃地加以纠正说：“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本身就属于虚乌有。历史上只有地主阶级搞血统论，资产阶级是反血统论的。这是常识。”显然，何先生并没有真正读懂我们这段话的意思，也没有注意我们所指的特定背景。不过话说回来，“常识”有时也并不可靠。就拿血统论来说，地主阶级出身的曾国藩曾发表过“王侯将相本无种”的宣言，他是反对血统论的；被中共中央的决议定性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林彪却坚持“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出打地洞”的反动血统

论,何先生对此心以为然否?

总之,我们认为何先生在文学批评中坚持的观念和运用的方法虽然在今天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但其消极影响还是存在的。我们再次著文讨论,希望何先生也能由此反思自己的问题。

附记:本文凡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易竹贤、陈国恩的《〈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何国瑞的《评论〈丰乳肥臀〉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争——答易竹贤、陈国恩教授》(《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参 考 文 献]

- [1] 易竹贤. 鲁迅思想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何良昊)

Re-argument on Mr. HE Guo-rui' s Critical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YI Zhu-xian, CHEN Guo-e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ies: YI Zhu-xian (1935-),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HEN Guo-en (1956-),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bstract: Mr. He Guorui' s literary criticism is characteristic of dogmatism that demands literary works to meet his concepts. His critic practices show that he values abstract qualities of literary characters so high as to reduce literature to an instrument for the class struggle. In order to argue for his correctness, he violates basic academic principles by dissecting and distorting others' works and treatises.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dogmatism; instrument; garble